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三十七期 2000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37, March 2000.

全球化與後進國之經濟發展

瞿宛文*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y
Wan-Wen Chu

關鍵詞：全球化、發展策略、新自由派、修正學派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neo-liberalism, revisionist

投稿日期：1999年3月；通過日期：2000年3月

Received: March 1999; in revised form: March 2000

通訊地址：台北市南港區115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email: wwchu@gate.sinica.edu.tw

摘 要

本文檢視現今全球化趨勢，發現在貿易、投資各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戰後確有增長，但增長速度卻有相當差異，並且真正整合性的全球市場尚未出現。同時這全球化趨勢也不是一個新的現象，第一次大戰前的整合趨勢，被戰爭及保護主義所打斷。

後進國加入全球化過程看來難以避免，不過這是否對其有利？新自由派認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此主張後進國要參與國際分工，更要全面自由化依賴自由市場來發展經濟。修正學派學者則持不同意見，一方面他們同意後進國必須參與國際市場，才能學習到先進技術，但另一方面卻認為不能依賴自由市場來達成目標。他們認為市場永遠是不完美的，後進國要追趕先進國，必須有強勢政府干預用產業政策等工具，來策劃推動產業發展策略，如此才能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在戰後後進國之中，東亞是唯一縮短了與先進國距離的地區，而東亞同時是貿易依存度特別高、也以政府干預產業政策主導經濟發展的地區，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學派的理論。

戰後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已對於絕大多數的後進國而言，是個很嚴苛的考驗，衆多後進國失敗或近乎失敗了，而先進國的實質援助與新自由派的理論處方，多無濟於事甚至有害。在目前的國際情況下，後進國也只能自救。

Abstract

Examining the post-WWII globalization trend,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gree integration has increased in terms of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The speed of integration, however, varies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aspects and across regions. Despite the progress, a truly integrated global market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a reality.

What is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LDC? Neo-liberalism emerged in the 1970s, and its proponents believe reliance on free market the only way to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visionists think that strong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required to achieve successful industrialization. The latter agrees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is necessary for the LDCs to learn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but managed trade coupled with industrial policy, rather than free trade, is requisite to fulfill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 The fact that the successful East Asian NICs relied heavily upon trade but at the same time had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ends support to this argument.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presents a daunting challenge to the LDCs, and many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challenge. Aid from the DCs and the neo-liberal recipe did not help much.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a revisionist typ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seems a more feasible route to development.

1. 導言

汪暉（2000）的文章著重討論思想層面，經濟方面的討論當然不是重點，不過認為「中國社會在經濟領域迅速地進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是他論述中一個重要的對歷史發展的認定，同時也顯然是一問題與焦慮的來源。汪文不可能正面處理「進入全球化過程」的優劣問題，但這問題之重要性極為明顯，故本文將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全球化至今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不過它到底是什麼意涵，它是否是一無可抵擋的趨勢，後進國家在參與全球化之後，是否會失去自主性，而擔任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命定的邊緣位置？

關於對全球化影響的看法，在全世界佔主導地位的是以主流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自由學派（neo-liberalism），也就是這三十年來在歐美領導風潮的新保守思潮。這派學者認為自由市場是解決經濟問題、促進成長的最佳機制，依據比較利益理論，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到適合其條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貿易能使所有參與者都獲利，是最佳的體制。至於資本的流動，此派學者認為外人直接投資（對產業實質的生產性投資），必然會帶來先進的技術，對當地影響必是有利的。不過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帳的全面開放是否如自由貿易一般，帶來雙贏的結果，則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爭議的¹。

1. 贊成者認為讓資本去自由追尋最好的報酬，是會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反對者就認為高度流動的短期金融資本，對於地主國只會帶來金融波動與傷害，如果地主國缺乏資本，那應該是吸引外人進行長期生產投資，而非金融資本。提倡自由貿易最力的 J. Bhagwati，就激憤的認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優點，被提倡資本自由流動者不當的利用，他認為有一個菁英集團盤據在華爾街——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藉由自由化的正當性，在全世界推動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圖利自己。參見 Bhagwati (1998) 以及 Rodrik (1998)。同時，如 World Bank (2000:37) 所示，外人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動性比金融資本要低。

新自由派對於全球化趨勢產生的原由，則多半採「中性」的解釋，如運輸以及通訊技術的變革，使得流通成本大為降低，因而使各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流動更為容易等，或是由於 GATT/WTO 的貿易談判²，以及近年來美國主導的自由化的政策。既然自由貿易是最佳策略，美國政府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近二十多年來，持續施壓要求眾多後進國家開放市場進行自由化的作為，在新自由派眼中，當然是正義之舉。

這個居主導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國際上仍居領導地位，所受到的挑戰基本上是來自廣義被稱為修正學派（the revisionist school）的陣營，而後者的批評比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盤否定。近年來的爭議主要包括關於東亞經濟發展中國家以及產業政策的角色，關於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經濟改革的策略問題，關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強迫落後國家採行自由市場策略的問題，關於全球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不穩定的問題等（這些理論爭議將在文後 3.1 節中再討論）。

不過修正學派並不全然反對全球化，也不會主張落後國家不參與國際市場與世貿組織，主要是挑戰自由市場理論，並對制度與政策提出不同的論述。

主張後進國不參與國際市場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風行一時的依賴理論，不過此理論影響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中也影響力大不如前。倒是先進國美國中一向主張保護主義的工會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時會引用此理論來合理化其保護主義的立場，聲稱其保護主義不會傷害到第三世界的勞工³。

2. GATT/WTO 縮寫分別代表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 近來在美國反對全球化的力量興起，譬如去年（1999）年底在西雅圖反世貿組織、以及今年春在華府反世銀與貨幣基金年會的龐大示威，就清楚的顯現了它在美國社會上的力量，一些美國左派學者也提出反對全球化的論述，參考 Baker, et al. (1998)。美國政府為了爭取工會支持，在政策上支持在世界貿易協定中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之要

很多後進國已相當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徑，其中較成功發展的東亞等國，是全球化過程的得利者，而其他後進國雖未必得利多少，但在當前情勢下，也只能希望在參與國際市場時得到較好的條件。只有如中國大陸這樣開放較晚腹地廣大的經濟體，才有條件與餘裕考慮是否加入世貿組織，並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對全球化的現象以及其體制的變革作一簡單的檢視，主要將討論近年來修正學派學者，關於全球化對後進國之影響所提出的看法。

2. 全球化的趨勢

2.1 全球體制的變革

國際市場整合程度的持續上升，並不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在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五十年，就也曾見到如此的現象，不過兩次大戰之間的數十年，是相反的潮流當道之時，保護主義與管制盛行，當然還有強權之間爭奪領域的戰爭。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在美國重新穩固霸權之後，歐美先進國才又開啓這戰後的整合過程。

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藍圖，主要是依據凱恩斯學派的設計，1944 年在美國 Bretton Woods 開會定下方案。相對於二次大戰前的失敗經驗，新體制著重穩定的秩序與管制，先進國家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強力調節國內經濟，對外維持固定匯率與資本管制，同時決議成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作為維持這體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過也相對應於戰前保護主義下不成功的成長經驗，先進國於 1947 年成立 GATT，決議互相開放市場，逐步協議降低關稅。

求；依據這提議對於沒有達到這些標準的產品，就要給予貿易制裁使其不能進入美國境內。並且其所要求的勞動標準，除了禁止童工與組織工會權等一般性工作權之外，更進一步要求設置或提高最低工資，並限制工時。可預期的，落後國家的政府都反對這樣的條款，參見 Amsden (1999)。

不過 GATT 剛成立時只有 23 個會員，這戰後秩序與制度的建立當然是由歐美先進國所決定，開放市場所指涉的也是先進國之間的關係。二次戰後眾多殖民地先後在政治上獨立，不過在那時，或許是後進國實力還是太微不足道，美國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忙著逼迫後進國開放市場，同時對後進國的輸出也比較開放，因此對後進國而言，在 1980 年代以前這段時間，它們不單可以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同時先進國市場開放的程度也比較高。

一般認為「市場開放程度隨著 GATT 貿易談判的成功與日遽增」的說法，其實只是從歐美的觀點來看才是屬實。譬如說，早期的貿易談判主要是先進國之間互相在利益交換原則之下，談判調降關稅的幅度與範圍，但先進國本身保護程度原本就不高，如 1973 到 1979 年的東京回合貿易談判⁴，先進國的關稅從平均 7% 降到 4.7%。相較之下後進國關稅原本就高，後其在壓力下調降關稅的幅度就很大⁵。

最重要的變化，當然是在於歐美政治與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 1970 年代之後，原先戰後秩序的繼續，在國際與歐美國內都遇到很大的阻礙，凱恩斯經濟政策與社會民主福利模式的發展遇到瓶頸，失業、生產力停滯、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難題併陳，已難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決。在此情況下新自由派全面抬頭，在政治上以英國首相柴契爾以及美國總統雷根的上台為代表，思潮上則是提倡自由市場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成為主導性意識形態。

到了 1980 年代新自由派經濟政策成爲風尚，在柴契爾與雷根領導推動下，私有化（在美國是去管制化 deregulation）、自由化與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當性的目標。同時在先進國之間，固定匯率體系已經在

4. 至今貿易談判共舉行了八個回合，早期參與者較少、談判範圍較窄、談判時間也較短。

東京是第七回合，共有 99 個國家參加，第八個烏拉圭回合是從 1986-93 年。

5. 以台灣爲例，平均關稅在 1984 年爲 30.8%，至 1997 年已降爲 9.8%，實際關稅負擔率，即以實際關稅收入除以進口金額，則 1980 爲 8%，1997 年爲 3.4%。參見陳添枝（1999）表 1 與表 4。

1970年代初期解體，其後各先進國採取浮動匯率，並逐漸各自放寬資本管制，開啓了日後金融市場走向整合的發展。另一方面，後進國在1980年代初期陷於國際債務危機之中，在美國推動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全面轉向推動新自由派的政策，它們的新作法是在有困難的後進國中，提出緊縮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對方自由化開放市場、私有化、減少財政赤字並減少社會補貼等，實行這樣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決條件。至今這樣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稱為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⁶。

同時，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生產力成長開始停滯，年成長率從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經濟問題層出不窮，到了1980年代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居然開始受到日本的挑戰，驚愕之餘，甚至有人開始懷疑美國是否要步大英帝國之後塵而開始走上衰敗之路。更重要的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貿易赤字日漸龐大，在短短幾年中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最大的債務國。

美國一些較老舊的工業，如紡織、汽車與鋼鐵，受到進口品很大的威脅，也開始向政府要求協助⁷。美國政府也開始用各種方法來提供協助，如要求日本等國「對出口自動設限」，或自行對進口品徵收反傾銷稅等。不過最重要的是開始積極推動自由化，積極逼迫日本以及東亞新興工業國調升匯率並開放市場。1985年先進國間達成Plaza Accord，美國先迫使日圓升值，下一年就來逼東亞南韓與台灣的匯率升值，同時美國國會通過所謂的超級301法案，開始每年以此為武器以貿易制裁為要脅，要求個別國家開放特定的市場，讓美國資本進入⁸。

6. Williamson (1994:26-28) 列出了這個共識的清單。

7. Cline (1984) 就討論在各產業中當進口的市場佔有率超過某種限度後，國內要求保護的要求就會出現。

8. Stiglitz (1999:10-11) 就批評美國政府利用減少雙邊貿易赤字的理由，來逼迫他國開放市場，這作法不單理由錯誤，並且會使得後進國懷疑美國的意圖以及自由化的好處，更進而質疑整個貿易體系的公平性。一方面雙邊貿易赤字未必顯示貿易障礙的存在，

在此同時，1986 年到 1993 年進行了 GATT 第八回合的談判，歐美先進國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導下，推動了更進一步的自由化，並且第一次涉及工農業產品之外的服務業以及智慧財產權的規範。最重要的決議是決定成立一常設機構——世界貿易組織，並設立協調仲裁貿易糾紛的機制，世貿組織於 1995 年成立，現已經有 134 個會員。

雖然在表面上平均關稅至今已經大幅降低，非貿易障礙也逐步減少，不過這個架構離真正無障礙的自由貿易，還有非常大的距離。譬如說國家對研究發展進行補貼還是被允許的，因為美國不可能放棄對自己國防工業的補貼，歐洲國家則堅持保留對國內發展較落後的地區給予補貼的權力，而歐美當然還是規則設定的主導者。同時各國還是可以用反傾銷措施來抵拒進口品，而反傾銷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國與歐體⁹。

2.2 全球化趨勢之變化

以上是對現在全球貿易體制變革的簡要描述，不過在這體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達到了何種程度？全球化的趨勢確實存在嗎？

一般談全球化會從貿易、資本流動、以及人力移動等三方面來看。在貿易方面，通常是用出口或貿易總值與 GDP 的比例為指標，來衡量各經濟體參與世界市場的程度。就世界總體而言，總出口佔 GDP 的比例，確實從 1950 年的 7% 上升到今日的 19% 左右，貿易量成長了 16 倍，生產總值則只擴大了五倍半。在戰後貿易比例雖清楚升高，不過對一些西歐國家而言，它們在 1913 年之前也曾達到如此比例¹⁰。同時若觀察歷史上不同時期貿易比例的變化率，則可發現最大的變化是發

貿易赤字主要是顯示一國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額；再一方面，自由化應能讓後進國從中得利，而不是當作一種懲罰。

9. 一些新興國顯然學了先進國的榜樣，開始大量利用這工具，以致在反傾銷案數目上漸趕上先進國，參見 World Bank (2000:60).

10. 參見 Economist, Oct. 18, 1997, 及 World Bank (2000).

生在 19 世紀，二次大戰後貿易比例的成長率並不特別高¹¹。

因此二次大戰後貿易比例雖確實上升，但增加速度並未加快，至今也只是剛超過 19 世紀的高峰值。同時，國家經濟之間的界線仍非常明顯，即使就鄰國而言，產品市場在國境內的整合程度仍遠遠超過跨國界的關係，各個國家的產品價格也並未顯現趨於一致的趨勢。雖說形式如此，不過國際貿易的產業內容有相當變化，後進國整合進這體系的性質也有顯著的不同，因此整合之影響也與從前不同。譬如說，後進國出口中工業產品的比例已從 1983 年的 42% 升至 1997 年的 66%¹²，同時後進國在近十多年來貿易依存度（貿易總量與 GNP 之比例）大幅提高，從 1987 年的 35% 升至 1997 年的 48%¹³。

資本流動可分為直接外人投資與金融資本流動兩種，外人直接投資 (flow) 現約佔全球總投資量的 6% 左右，而外人直接投資的資本存量 (stock) 與全球生產總值的比例現則約為 10%，而這比例在 1913 年是 9%。其實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殖民時代，英法荷等國對外投資的數目，有時會高至等於其國內投資數量，規模遠遠超過今日¹⁴。雖然流向後進國的外人直接投資的數目在近年來比重稍有增加，不過以 1997 年的存量而言，七成仍是先進國之間的互相投資，剩下的三成才是流向後進國¹⁵。

外人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角色密切相關，雖然外人直接投資仍是以先進國為主，不過其在後進國的影響非常深遠，跨國公司因擁有先進技術，而能長期佔有國際主要產業的領導地位，這地位至今仍非後進國所能挑戰。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值，其佔全球總

11. 參見 Baker et al. 1998, Table 2, p. 6.

12. World Bank (2000:269) .

13. World Bank (2000:5) .

14. 參見 *Economist*, Oct. 18, 1997; Baker et al. 1998, Table 5, p. 9.

15. 參見 UNCTAD (1998),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able 1.3, p. 5. 這比例分配歷年來有相當變化，譬如說外人直接投資到先進國的比例在 1985 與 1990 年分別為 72.3% 與 79.3%。

產值的比例，由 1982 年的 5.3% 已升至 1997 年的 6.9%，而它們的出口在 1995 年佔世界總出口的 32%¹⁶。

在過去這十多年來，主要在美國的壓力下，世界各國確實大幅降低了對資本移動的限制，因此全球金融資本的流量大增，匯率以及金融商品的跨國交易量年平均成長率近三成，在美國債券與股票跨國交易量對 GDP 的比例，在 1980 年只有 9%，到了 1995 年達到了 135.5%¹⁷。

金融資本流動的大幅增加，是導致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頻傳的主因之一¹⁸，無論是 1994 年的墨西哥危機或 1997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雖說各國國內金融問題也是危機發生之必要條件，但流動性高的短期國際金融資本之進出，是引發危機並使其惡化的主因，雖說支持金融開放的新自由派學者認為只要金融市場健全，則開放不是問題，但後進國的特徵之一就是市場制度尚未建立完善，它們本身問題已經夠多，實不需要額外的風險負擔¹⁹。

不過到處流竄的金融資本，雖增加了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不過整體的國際金融體系尚稱不上是一整合的市場，國界內的關係緊密度仍遠超過跨國界的關係，國內的投資資金來源仍主要出自國內的儲蓄，即使先進國之間的利率也沒有清楚的趨於一致的趨勢²⁰。

至於人力的移動則是清楚的沒有整合的趨勢。在 17-18 世紀大量非洲人被賣到美洲當奴隸，十九世紀中則有數千萬名亞洲苦力被賣至各地，另一方面西歐約有六千萬人選擇移民到新殖民地，在那帝國主

16. 參見 UNCTAD, 1998, Table 1.5, p. 6.

17. 參見 Baker et al. 1998, Table 6B, p. 10.

18. 探討東亞金融危機肇因的文獻極為豐富，可參見 Stiglitz (1998)，Radelet and Sachs (1999)，Adams et al. (1998)，以及 Nouriel Roubini's Asian and Global Crisis Homepage.

19. 參見 Stiglitz (1998)。

20. 歐體間協調貨幣政策的結果則尚待觀察，不過那主要會是一政治決定的結果，而非市場趨勢。

義時代移民管制並不普遍。二次大戰之後，移民管制成了常規，不過在戰後初期，先進國因勞工缺乏而進口後進國之外勞，但在 1970 年代成長趨緩之後，又開始嚴格管制直至今日。至今若有任何勞動力全球化之現象，那就只限於一些特殊的專業人才，或是跨國公司的經理技術人員，或是後進國的腦力外流到先進國。後進國雖曾在貿易會談中要求先進國放寬人力流動的限制，但這可能性顯然不大。

2.3 全球化趨勢會逆轉嗎？

由上討論可見貿易、資本、人力方面的全球化趨勢之顯著程度各異，不過在未來，這全球化的趨勢會繼續發展嗎？這問題的答案至今並未有共識。誠然樂觀者認為趨勢難擋，不過這個全球化過程的主導者是歐美先進國，尤其是美國，而美國國內的政治的發展已經產生變化，日後美國政府是否會如以往一樣全力推動全球化，則未必是沒有疑問的。

譬如說，去年底西雅圖的世貿組織會議，以及今春在華府的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會議，都引來了大批的示威者，規模之大近年僅見引起世人注目。示威者的訴求雖然相當歧異，但主要反應了美國人一般對全球化影響之焦慮，而這對美國大選政治必會產生影響²¹。

若真有轉變，則在歷史上也有先例。在 1913 年之後到二次大戰之前，先進國各自扭轉 19 世紀全球化的趨勢，而轉向保護主義。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之前全球化造成國內不平等所帶來的反彈²²。而現在先進國國內，類似的問題是否正在累積，矛盾是否正在激化，以致未來可能會產生對全球化的反彈，以致美國會改變推動全球化的政治立場？

21. 參見 *Economist* (April 15, 2000, p. 29-30). 文中引用民意調查顯示，61% 美國人贊同全球化，但是更多人同時認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太忽視美國勞動者的利益，並贊同貿易條款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

22. 參見 Williamson (1996).

近三十年來美國國內的所得分配持續惡化，有技能與無技能者的勞動報酬差距日益擴大，即術語所謂的技能溢價 (skill premium) 提高了，不過這是否是源於與後進國的貿易，意即後進國的進口是否造成美國低技能工人的工資下降²³？歐美工會以及一些親工會的左派學者，確實是持如此看法，並因而主張保護主義，或是要求世貿規章中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由實證上檢測國際因素對美國薪資差異之影響的研究不少，至今結論則多是「有影響但不大」²⁴，不過這當然還是有爭議的議題。

有學者認為全球化的影響不只是表現在技能溢價提高與否的問題上，全球化使得有技術有資產能夠從全球化中得利的人，與無法從中得利的人，兩者之間的鴻溝隨全球化日漸擴大，但同時在新自由派政策的影響下，可以協助後者調適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近二三十年來已經大為減弱，使得問題更形嚴重。即使對全球化的反彈最後不發生，階級嚴重的對立必也會帶來社會問題，社會中全球化的勝利者也將要為此付出代價²⁵。

總之，先進國尤其是美國國內的情勢，會影響到美國政府在國際推動全球化的決心，這些發展對全球化之趨勢是否持續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3. 全球化對後進國經濟發展之影響

3.1 經濟發展思潮變遷

由上述討論可以看出，這個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演變，主要

23. 或許是因為工會以及其他制度的力量，西歐各國中低技能工人的薪資，沒有發生像美國這樣大幅下降的現象，不過有人認為高失業率是其代價。

24. Cline (1997) 的測估結果是 20%，亦即國際因素可以解釋二成美國薪資差異的增加，而這在眾多測估結果中是比較高的估計。Krugman (1995) 認為從後進國進口製造業產品的貿易量太小，約只佔先進國 GDP 的 2%，因此影響不大。

25. 參見 Rodrik (1997)。

是由歐美先進國主導，不過這是否意味著後進國在這體系中無法有自主性，只能據有命定的邊緣性受剝削的位置？這是否意味著不加入這體系對於後進國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在二次戰後初期，主流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一般皆持樂觀的看法，其中最甚者如現代化學派就認為，若假以時日後進國必能跟隨先進國的步伐而發展，不過結構學派則強調後進國的結構弱點，因此需要鼓勵或扶植私人投資，並採取進口替代政策等。到了1970年代前後，因為多數後進國經濟發展並不成功，作為對原先現代化理論之批判，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因應而生。依賴學派主要依據拉丁美洲國家的失敗經驗，而認為後進國與先進國的關係正是問題之所在，後進國與先進國的經貿關係越密切，則受到傷害越大越無法成長發展，無論是貿易與投資的關係，都是先進國得利而後進國反而受損。

在此同時，主流經濟學中新自由派崛起，他們却是從另一角度批評結構學派，此派學者認為東亞四小龍能夠成功發展，而拉丁美洲反而失敗，主要是因東亞採取出口導向與對外開放的策略，而拉丁美洲則相反，因此其實是證明了自由市場理論的優勢。

修正學派則對東亞經驗有截然不同的解釋，此派學者認為東亞發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是發展取向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發展過程中國家以強力干預方式來扶植新興工業，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政策並用，國際市場不單提供實踐經濟規模的可能，更提供了國家規範資本檢驗成果的工具²⁶。

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給依賴理論很大難題，因為這些經濟體出口依賴度很高，但這樣的「依賴」關係顯然並沒有阻礙其成長，甚至反而有助於其成長。更重要的是在理論上，「依賴」難以清楚定義，貿易與投資為何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結果，為何必然成爲中心剝削邊

26. 參見 Amsden (1989) 對南韓以及 Wade (1990) 對台灣的研究。

緣的機制，則也是在理論上很有爭議的問題。同時即使馬克思學派本身看法也相當分歧，Warren (1980) 在他這本以「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先鋒」為名的書中，就批評依賴理論是後進國國族主義的迷思 (nationalist mythology)。這二十年來在學界其實依賴理論已不太得到重視。

東亞經驗其實再次證實，後進國必須要學習先進國的技術與經驗，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對小國是不可行的選擇，Gerschenkron (1962) 就曾對「落後」提出了很辯證的看法，亦即落後必然是包袱，但也可以是動力，越落後就越有進步的可能，可以學習的先進技術就越多，也越可以躍進 (leapfrog) 的方式，來直接用最先進的技術來進行工業化，這在 21 世紀在先進與落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之時，顯得有點太過樂觀²⁷，但也表示追趕的急迫性，不過無論如何，閉關自守不是合理的作法。

新自由派政策已經主導世界經濟發展近二十多年了，近來的爭議多與對此主導性理論與政策之批判有關，即眾多學者針對這些年來在全世界範圍內所進行的經濟革新 (economic reform) 提出批判。譬如對於東歐等國經濟轉型的問題，修正學派就批評新自由派所提出並被採用的休克治療 (shock therapy)，認為其因迷信於自由市場理論，而無視於市場機制必須依賴各種非市場制度的支持才能運行，以致於這些經濟體在採用這樣政策後，至今都尚未恢復到革新前的水準²⁸。譬如這幾年來的國際性金融危機，引發了眾多對金融開放的質疑，以及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批評²⁹；同時這二十多年來，世銀與貨幣基金在第三世界所推動的經濟革新，尤其是其緊縮方案，對於第三世界

27. Amsden (1989) 就認為到了 20 世紀後期，因技術差距太大並且技術多為跨國公司的私產，躍進已不可能，因此如東亞之後進國就只能先靠學習 (learning)，來縮小與先進國的差距。

28. 參見 Chang and Nolan (1995)。

29. 參見註 18。

國家成長的影響，也引起不少的批評與爭議³⁰。

由此脈絡來看，現今依賴理論其實已經失去影響力，只是此次在美國工會保護主義者，反對全球化影響之時又再次出現，作為支持他們反對後進國出口導向發展的理論依據。

現今當然全球化成了眾人所注目的議題，世貿談判的進展，先進國尤其是美國提出在貿易規範中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之要求，極具爭議。如本文第一節所述，對於全球化，新自由派是採積極肯定態度，在下節將呈現修正學派對此所提出的不同的看法。

3.2 修正學派的看法

後進國發展的途徑為何？後進國能從全球化中得利嗎？這些問題古來有之，其所牽涉的理論議題也絕非新的問題，只是現在環境當然有所不同。

在先進國本身的發展來看，分工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是無可置疑的，如亞當·史密在其名著《國富論》開宗明義所言，同時他認為分工的程度會依市場的大小而定，市場範圍越大，分工可以越精細，生產力進步越大。馬克斯雖將資本主義下生產力不斷變革的動力來源，定位在資本對利潤的追求以及市場的競爭，不過他對分工與生產力之間的看法，與亞當·史密並無基本差異³¹。

不過對於後進國而言，參與國際分工是否能夠提升自身的生產力，並不是一個有清楚答案的問題。新自由派認為答案是清楚肯定的，依賴理論認為是否定的，修正學派則是有條件的肯定與否定。

新自由派認為依據比較利益理論，在自由貿易情況之下，任何後進國都能在國際分工的光譜中找到適合自己的生產與貿易產品，但是問題是後進國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所能找到「適合的」生產活動都

30. 參見 Stiglitz (1998)。

31. 精細分工對勞工造成的疏離問題，技術變革必會帶有便於資本統治的偏向等問題，無法在此多作討論。

會是低附加價值類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利益理論並不說明，後進國如何可以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在比較利益的階梯上晉級。譬如說非洲國家的比較利益可能只是輸出礦產或初級農產品，但要如何踏上工業化之路則似乎無跡可循。

修正學派則指出至今為止，任何一個成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或許除了工業革命先驅英國之外，都曾經過國家干預、保護幼稚工業、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美日德皆是如此，今日的東亞後進國也如此，絕非在自由貿易情況下「自然」發展升級的³²。

其實在戰後，全球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整體來說並不好，東亞是唯一能夠縮小其與先進國之間差距的地區³³。根據 World Bank (2000:14) 在過去三十年來，排在中間三分之一的國家，其人均所得從原來先進國水準的 12.5% 降為 11.4%，而最窮的三分之一國家，這比例從 3.1% 降為 1.9%。有研究甚至指出，從 1870 到 1990 年間，最貧窮與最富有的國家人均所得的差異增加了六倍³⁴。先進國大致維持穩定的成長，並且其相互間所得水準有趨於平均化之趨勢，但是絕大多數的後進國却與先進國差距越來越大。

重要的是在二次戰後，落後國家之間經濟成長的紀錄差異相當大，而發展最成功的東亞，也正是由發展取向國家強力干預經濟發展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拉丁美洲發展趨勢有相當的起伏，從原先二十世紀初相當接近先進國的水準，至今則已經被東亞等國超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則是悲慘的大陸，人均所得從戰後至今幾乎是零成長。東亞四小龍則能持續維持成長，戰後人均所得年成長率平均超過 5%³⁵，其他亞洲的所謂的第二梯次新興國，則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有相當

32. 參見 Shapiro and Taylor (1990)。

33. 即使如此，至今台灣的人均所得也只達美國的四成。

34. 依據 Pritchett (1997:Table 2)，最富與最貧的國家的人均所得之比例，在 1870 年為 8.7，在 1990 年為 45.2，而先進國之平均與所有其他國家平均人均所得之比，則由 1870 年的 2.4 升為 1990 年的 4.5。

35. 參見 World Bank (1993:2)。1965-1990 年拉丁美洲人均所得年成長率平均為 1.8%。

高的成長率，不過成長趨勢為時較短且較不穩定³⁶。

東亞確實是採取了出口導向政策，並且藉由出口數量的急速成長，而對生產技術進行了快速的學習，不過更重要的是，發展取向國家同時也利用進口替代政策來扶植中上游的重化工業以及高科技工業，亦即國家主導產業的發展策略，主動的促進經濟體在國際分工階層中位置的提升，推動比較利益的升級。同時如 Amsden (1989) 所言，國家對資本的補貼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東亞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國家設法以國際競爭力的表現來規範資本。

同時如修正學派學者 Amsden (forthcoming) 所指出，東亞在過去的發展策略下，主要在擔任生產及學習的單位是本地的企業，而非外國跨國企業，也正是這些本地企業學習了先進技術，因此未來才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相反的，早期實行進口替代、而非出口導向的拉丁美洲國家，至今主要產業已經皆是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局面，因此國家未來更無法掌握本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動權。亦即這方面與依賴理論所預期的相反，貿易的依存度與本地資本的成長，其實未必相衝突，重要的是誰能掌握成長與學習的契機，學習與成長的主體必須是在地的。

當然這經驗的意涵必須謹慎解釋，東亞只是後進國中的少數，並且多是小國，原本就不可能依賴國內市場為基礎來發展，這經驗對中國大陸、印度、印尼及巴西等大型國家的意涵為何，則須再做討論。同時，東亞雖成功的發展資本主義，或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了生產力，但至今仍只是成功的跟隨者，離追趕上先進國有相當大、且看來不易再縮短的距離。

不過這並不表示這些經驗對其他後進國沒有意義，相反，對東亞經驗做出適當的解釋，應能對其他後進國有相當助益。東亞經驗主要

36. 依據 Pritchett (1997:13-14)，在樣本內 108 個後進國之中，它們在 1960-1990 年之間，有 10% 的國家其人均所得的成長率超過 4% (這些成功起飛的國家主要包括東亞等國)，另外有 37% 小於 1%，26% 小於 0.5%，15% 負成長，差異相當大。

教訓是，東亞之所以能成功發展，是因為其國家成功扮演了主導產業發展策略的角色，並運用出口與國際競爭力作為規範受扶植產業的獎懲標準，它們同時採取保護國內市場與出口導向的政策，由兩方面來培植本地資本。

同時，東亞發展取向國家能夠成功的執行這些發展政策，是因為其社會中財富分配在啓始階段就相當平均，在發展過程中成長的果實也能相對的普遍共享。Campos and Root (1995) 認為東亞成長成功之關鍵在於「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產業政策必然意味著國家要選擇性的給予補貼與獎懲，作者們認為東亞國家用實際的作為，讓人民相信可以分享到未來成長的果實，因此能夠順利推行增進全體成長的產業政策。除此之外如 Amsden 與 Wade 等修正學派學者，也都強調所得分配平均對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助益。關於發展取向國家的構成條件，以及其與政治民主的關係，有相當多的文獻，因本文著重於全球化經濟面向，無法在此對這些文獻多作討論³⁷。

而東亞能夠採取這種策略，當然部分是因為在 1980 年代之前，東亞發展出口替代時，歐美尤其是東亞的主要市場——美國是比較開放的，那時美國尚不覺得受到後進國的威脅，因此東亞既能保護國內市場，又可以進入美國市場。但現在歐美已經不再如此開放，美國在覺得受到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小國威脅之後，隨時舉著 301 的大棒，脅迫各後進國開放市場³⁸。

因此比起從前，如今其他後進國所面對的國際市場的處境，是不同於當年東亞所面對的，相對而言困難更增加了。自由貿易下被迫過早開放國內市場，當然會不利於後進國工業化的企圖，不易進入先進

37. 如 Evans (1995) 討論發展取向國家，如何能對社會同時保持密切合作關係，而又維持其相對自主性；如 Robinson and White (1998) 就針對以往發展取向國家必然不民主的說法，而提出民主的發展取向國家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的論述。

38. 不過 Yoffie (1983) 認為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成功的從長期發展的策略觀點，來對付歐美政府所提出的短期應急的市場限制措施，用短期的讓步換取長期的利益，成功的維持了貿易體系的穩定，並增加了貿易所得。

國市場，則不利於後進國藉由出口導向來進行生產學習與工業化。如果世貿組織真的在歐美國家的推動下，通過了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則顯然會對後進國的工業化更是一大打擊。

不過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成形，成員數目不斷增加，弱小國家也沒有不加入的餘地³⁹。東亞各國比較有餘裕，也大致做了加入的準備⁴⁰，一方面瞭解如何應付美國的要求以及世貿的各種規範 (how to get around the rules)，同時也希望可用世貿的架構，來抵擋美國的 301 之類的單方面獨斷的威脅。同理，其他更缺乏實力的後進國，只能希望世貿能替他們打開先進國的市場，同時擺脫美國專斷的統治。世貿雖是先進國打開市場的制度設計，但弱小的後進國還是發現它優於美國的獨裁，或許甚至如中印等大國也是有此考量。

全球化或國際市場的競爭，使得後進國之間的差異擴大了，並且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如東亞這樣各種條件比較好的後進國，就有能力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以產業政策來主導經濟成長，利用參與國際市場的機會，來學習並追趕先進國。而像非洲有些國家，則尚沒有這些條件，無法承受國際市場的壓力，長期以來經濟難以進步，甚至飢荒內戰等天災人禍不斷。

在更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國家角色在全球化下並未消失，只是環境不同，作法必須改變，而且對於國家角色的挑戰與要求，可說是更高了。因此後進國若要改善生存條件，至今為止，除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發展經濟外，在現實上並無其他選擇。

歐美先進國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了高度的生產力，但其過去二百多年的發展過程，絕不是個美麗的歷史。東亞近年來淺盤式的經濟發展，也呈現了其相當醜陋的一面，發展過程中對勞工的壓制與剝削，社會

39. 根據 World Bank (2000:53)，1982 年尚有 23% 的世界出口是在 GATT/WTO 規範之外的，到了 1997 年只剩 10%。

40. 雖說如此，越南韓這樣實力較強的後進國，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在加入 OECD 之後，卻因為金融自由化的配套措施沒做好而摔了一大跤。

的不公，環境的破壞等，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過近日來有些先進國的進步人士，藉由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來反對發展主義，提倡反發展主義（anti-developmentalism），這實在是個錯置的說法。在後進國發展之時，要求他們參考先進國當初在環保上失敗或錯誤的經驗，以更先進的環保知識來進行開發，這應是非常合理而有幫助的說法。「不計一切為成長」的作法當然不符合後進國人民的長期利益，但若認為不發展是環保的最佳方式，而要求後進國為了環保不發展，則是無視於後進國人民受困於失業與貧窮的困境，無視於後進國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實在是歐美中心的看法。現有各種國際公約或談判，來處理如生態保育及全球氣候變遷等問題，在運作上尚稱順利，因此美國為何主張要在世貿條款中加入環保標準，當然令人懷疑其保護主義的意圖⁴¹。

4. 結語

由上述對現今全球化趨勢變化的檢視，我們發現在貿易、投資等各個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戰後確實在增長，增加的速度却有相當差異。不過民族國家的國界仍非常顯著，真正整合性的全球統一性市場尚未出現，即使近年跨國流動量增加最快的金融資本方面，也尚未整合到有全球性市場的程度。

同時，這全球化趨勢也不是一個新的現象，第一次大戰前的整合趨勢，被戰爭以及兩次大戰之間的保護主義階段所打斷，二次大戰之後這趨勢又在歐美先進國領導下，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再次開始滾動。

全球化趨勢的動力確實來自資本擴張的需求，企業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必須不斷擴張爭取更多的市場，在此需求下各種降低運輸與溝通成本的新技術也不斷被發展出來，使得國際市場能更進一步發展，

41. 參見 Stiglitz (1999).

市場上的競爭也日益激烈。不過這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與規則，仍是由民族國家間經由談判與角力來決定，國家在國界內的各種政策也具關鍵性作用，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甚或打斷這所謂全球化的趨勢。

在貿易方面，戰後世界貿易量不但持續的增長，並且成長速度一直超過 GNP 的成長率，因此貿易依存度普遍增加。後進國的貿易依存度，在近十多年來更是大幅增長並超過先進國的比例，而後進國的出口中工業產品的比例也持續增長。

不過貿易依存度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如何，則各國的情況相當分歧複雜。後進國在戰後經濟發展的成果整體而言並不好，人均所得平均年成長率，非洲為零、拉丁美洲低於 2%，東歐在開放之後不斷倒退，至今尚為回復到原先水準，只有東亞接近 6%，是唯一成長率超過先進國的地區，也就是唯一縮短了與先進國距離的地方，亦即除了東亞之外，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同時東亞却是貿易依存度特別高的地區。

戰後初期歐美在國際市場秩序穩定之後，開始經由談判互相開放市場的過程，並為此建立 GATT。不過此時他們的市場對後進國比較開放，並且也不多要求後進國開放市場，因此給予東亞等國採取出口導向發展策略的空間。

在資本流動方面，外人直接投資的數目其實一直有相當波動，並且至今也是大多數流向先進國，即使近年來流向後進國的數目有增加，其分配型態也是分佈很不均勻的。而東亞在發展過程中，對外來投資的依賴極為有限。

金融資本的流動在近十多年來，顯現了最清楚快速的增長，遠超過貿易與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在 1970 年代初，原先 Bretton Woods 體系解體之後，金融資本的跨國大幅流動在先進國間就已經開始。不過對後進國而言，是在 1980 年代後，美國協同世銀與貨幣基金，持續脅迫後進國開放資本管制之後，後進國才開始受到這現象的波及，而後進國金融制度必然不夠健全，因此也導致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不斷

的發生。

到了 1970 年代，歐美國家中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派興起，到處推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同時，美國生產力成長停滯，貿易赤字大幅增長，一些傳統產業感受到日本以及東亞後進國進口品的威脅而要求保護。美國政府的對策是運用其超強的霸權地位，在國內採取更多保護主義措施，在國外以貿易制裁為威脅，要求貿易對手國進行自由化，開放產品及金融市場。美國同時協同世銀與貨幣基金，要求各後進國推行自由化等所謂華盛頓共識政策，並在與此同期間舉行的第八回合貿易談判中，推動更進一步的自由化，包括保護歐美的智慧財產權規範。而於 1995 年成立的世貿組織，也是這個烏拉圭回合的決議。

後進國雖並不信服貿易規則的公平性，不過世貿組織大勢已定，後進國也陸續加入，希望能用世貿規範來抵抗美國的需索，而後進國的貿易依存度在近年也在持續增長。

弔詭的是在此同時，從全球化得利最多的美國，其國內近年來反對全球化的勢力日增，美國政府爲了爭取工會選票，也支持推動在貿易條款中加入勞動與環保標準。曾有研究指出，兩次大戰間爲何會出現保護主義，是因爲全球化利益在國內分配不均引起反彈所致。在新自由派影響下，社會福利日益縮減，更無助於減緩社會緊張。日後美國政府在政治上對自由化執著的程度，將會對未來世界全球化趨勢是否持續，有決定性的影響。

相對於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派，修正學派學者則認爲無論從理論上或從歷史經驗來看，純粹的自由市場無法帶來經濟發展。他們基本上認爲市場永遠是不完美的，市場的運行需要有眾多非市場制度來輔助支持，除了硬體的基本建設之外，必要的非市場機制包括財產權之規範、法律體系、社會福利、教育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都在在需要國家來扮演統籌推動與協調的角色。

同時，後進國要追趕先進國，必須以民族國家爲單位，用產業政

策等工具，來策劃產業發展策略，以補貼與獎懲並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業，扶植本地企業、盡快學習先進技術，如此才有可能在競爭日益激烈、先進後進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不單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並且在國際分工的階梯上逐步晉級，轉換並提升本國的比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經濟持續發展、生產力得以進步。

現今先進國領先差距日益擴大，並且先進技術皆掌握在跨國大企業手中，在如此情況下，後進國若不參與國際市場，則很難能夠很快的學習到先進技術、累積學習效果並培養生產能力。就學習先進技術、實現生產的經濟規模等因素而言，後進國參與國際分工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問題只是在於後進國如何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能夠發展自己的生產力、並且持續的提升自身的比較利益。而要能夠做到此目標，就一方面需要上述的發展取向國家的主導角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國際市場上的空間。在競爭日漸激烈的環境下，後進國要達到此目標的條件會越來越高，不過仍並非不可能。參與國際市場的程度與方式，會依國情而異，但是拒絕參與國際市場，在理論上缺乏根據，在實際情況上也難以實現。

東亞戰後成長的方式，正是如此模式。東亞發展取向國家在高度的危機感促使下，積極主導產業發展策略，一方面藉由參與國際市場來發展生產力學習技術，另一方面則以產業政策推動產業升級與深化。二次戰後其他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相對不成功，使得東亞經濟成長的經驗顯得例外，不過這成功的經驗，無論如何顯示了這種方式成長的可能性，也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學派的理論。

戰後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先進國與後進國經濟成長的紀錄顯示，這個體系對於絕大多數的後進國而言，是個很嚴苛的考驗。很多國家失敗或近乎失敗了，而先進國的實質援助與新自由派的理論處方，多無濟於事，甚至有害。但在目前的國際情況下，後進國也只能自救，此即是本文的出發點。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汪暉，2000，〈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7:1-43。
- 陳添枝，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貿易自由化〉，發表於《198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學術研討會，中華經濟研究院，3月，台北。

英文部分：

- Adams, C., D.J. Mathieson, G. Schinasi and B. Chadha, 1998.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s, Prospects, and Key Policy issues*, Washintong,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msden, A.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The Left and Globalization, *Dissent*, Spring, 7-9.
- , forthcoming. *The Rise of the Res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D., G. Epstein and R. Pollin (eds.), 1998,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hagwati, J., 1998.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May-June, 7-12.
- Camops, J.E. and H.L. Root, 1995, *The Key to the Asian Miracle: 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 Washintong,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hang, H.-J., and P. Nolan (eds.). 1995. *The Transformation of*

-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London: St. Martin's.
- Cline, W.R., 1997.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 1984.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Krugman, P. 1995.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55. Cambridge, MA: NBER.
- Maddison, A.,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OECD.
- Pritchett, L., 1997.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3, Summer):3-17.
- Radelet, S. and J. Sachs, 1999. 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A meetings in New York.
- Robinson, M., and G. White (eds.), 1998.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drik, D., 1998. Who Needs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7,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May):55-65.
- ,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Shapiro, H., and L. Taylor, 1990. 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World Development*, 18(6), 861-78.
- Stiglitz, J.E., 1994.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August, 11(2):151-77.
- , 1998. Must Financial Crises Be This Frequent and This Painful? McKay Lectur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3.
- , 1999. Two Principles for the Next Round; Or, How to Br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rom the Cold, Geneva, September 21.
- UNCTAD, 1998,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NY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illiamson, Jeff, 1996.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 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Compared*. NBER Working Paper No. 5491. Cambridge, MA: NBER.
- Williamson, John, 1994. In Search of a Manual for Technopols, in J. Williamso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ood, A. 1995. How Trade Hurt Unskilled Work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3, Summer):57-80.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 ,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 Yoffie, D.B., 1983. *Power and Protectionism: Strategies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